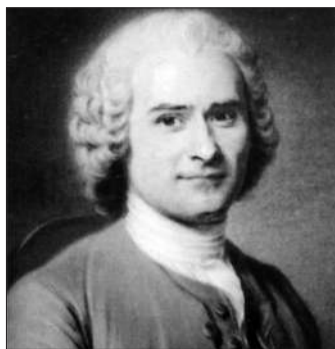


全集译出纪念卢梭诞辰300年

学者称卢梭思想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有正有负,有得有失



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。

新京报讯(记者张弘 吴永熹)今天是法国启蒙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家卢梭诞辰三百周年,学术界组织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。26日,上海交通大学主办了“从卢梭到马克思——纪念卢梭诞辰三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”,中外卢梭研究专家进行了主题发言和研讨。今日下午,由商务印书馆、首都图书馆联合举办的《卢梭全集》出版座谈会暨纪念卢梭诞辰三百周年活动,将在首都图书馆一层多功能厅举行。首都大学教授李平沅以一己之力翻译的九卷本《卢梭全集》也正式亮相。

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。他对新京报记者表示,自己早在北大求学时,因为阅读《忏悔录》而爱上了卢梭。1960年开始翻译《爱弥儿》。

从2006年开始,商务印书馆约请李平沅着手准备卢梭全集单行本的编译工作,在单行本陆续付梓之后,按照计划于今年将已先行出版的卢梭著作分类辑录,汇为全集,共分九卷。

李平沅称,“卢梭的理论著作翻译难度较大,牵涉的面较广,如政治、经济教育、法学、宗教学等等。卢梭的语言很简单,但是又很深奥,要达到严复所说的信达雅,很难很难。我期待着读者的批评。”

1924年生的李平沅,

思想评析

高全喜 我对卢梭爱恨交加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表示,“我对卢梭可以说是爱恨交加,这并非自己个人的阅读偏好,而是卢梭思想作为百年中国思潮理论的影响力的感慨。”

高全喜说,卢梭思想对于欧洲和中国,乃至全世界,300年来都是有正有负,有得有失。对中国来说,这种意味尤其深切和忧患。在西方,卢梭思想内在的革命性和深刻性,包含的天使和魔鬼的力量曾经引起轩然大波,但是,西方一百多

年来大体平静,卢梭思想会有一些冲击,有集体主义、后现代思想等等,但是基本上翻不出大浪。对中国来说,因为我们正处在转型社会,一个正常理性的人,对卢梭会有客观的看法。但是,很多人因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公,加上自己的生存境况不好,未必能客观理性,因为卢梭对于平等的激情,企图消灭私有产权等想法,容易使人产生毕其功于一役的情感冲动,但在现实中,又不可能立即建立一个人间的乌托邦。“卢梭的思

想有非常吸引人的魅力,如对平等、正义的追求,批判的锋芒以及理想主义,人权思想等等,这些在人类的灵魂中都是美好的东西。即便卢梭的集体主义在西方和中国已经带来了灾难,是有毒的罂粟,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人类心灵中应该有这些东西。”

高全喜说,“卢梭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,但是他的思想确实又有片面的东西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启蒙思想的产物,卢梭的思想也孵化出了这两种东西。”

家乡纪念

1712年6月28日,思想家卢梭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普通钟表匠的家庭。300年后,日内瓦政府决定举行为期一年的庆祝活动,纪念这位伟大的公民和启蒙运动的先驱人物。日内瓦的庆祝活动名为“所有人的卢梭”(2012 Rousseau for All),于今年1月19日正式启动。这些庆祝活动囊括了展览、演出、歌剧、音乐会、电影、学术会议、出版等人们所能想像的一切方式。日内瓦大学甚至开出专门课程,向公众介绍卢梭的思想。

然而,卢梭生前与家乡的关系却是非常紧张。他出生后不久母亲便离开人世,幼年时父亲便离开他弃国避祸。16岁时卢梭只身离开日内瓦。在他的著作《爱弥儿》出版后,因为害怕他的革命思想,瑞士当局在1762年将其驱逐出境,并将其作品在市政厅前烧毁。当然,历史流转,从前视卢梭为弃子的城市,如今用一年的庆典来褒扬这位“日内瓦的儿子”。

任剑涛 现在读卢梭,一个批判一个避免

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前不久刚刚推出了《建国之惑》一书,其中就有卢梭思想对于中国留法学生影响的内容。

他对本报记者表示,卢梭的观念首先对中国人有很大影响,比如他的人民主权思想与我们的国家建立,通过马克思主义为中介,发生

了深刻的影响。第二,卢梭的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,对于中国的民粹主义制度建构产生了很大作用,很长时间,中国人对于未来的展望充满了卢梭式的浪漫幻想;第三,对整个现代生活方式的不满,卢梭提供了非常多的抱怨和批判的武器。

任剑涛认为,现在读卢梭应该有一个批判和一个

避免,“一个批判是要像卢梭那样,对社会生活,对人生充满幻想和激情,因为我们搞市场经济三十多年来,整个社会物质化,理性主义、浪漫主义等等对于民生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,要避免走向高调民主,避免走向浪漫的批判主义,避免对现代性的和启蒙运动的拒斥。”

一路走,一路唱,一路写;《春天责备》后民谣歌手再出新书

周云蓬推出怀旧之作《绿皮火车》



周云蓬用绿皮火车寄托了怀旧的情怀。

周云蓬九岁失明,最后的印象,一列绿皮火车“哐哐哐”拉他去大上海。依稀十色霓虹,时代列车隆隆向前,一切被抛诸身后。时过境迁,继《春天责备》后,他写下新作《绿皮火车》。新作上市时,正值北京最便宜的绿皮火车将告别京城,引得大批人的怀旧和凭吊。

从19岁初扛吉他上路,绿皮火车拉来的那个质朴时代已不再。而他行路、歌唱和遇人一如当年,一边做民谣和公益,一边借各种音乐节上路。他说,创作者的内核,才气无所谓,诚实是最重要的。

时代让所有的地方大同小异

新京报:“绿皮火车”有一定的象征意味,你以此命名新书是为了怀旧吗?

周云蓬:我9岁失明,印象里上世纪70年代的火车就是那个颜色,绿皮火车是某种寄托,带进一些新的,带走一些旧的,像船的码头,具有古老的仪式感,这种感觉比机场和汽车站来得强烈。当你来到空落落的一个站台,会想,这里曾经,正在和将要发生什么?这个时代在迅速地消解一切意义,什么都淘汰得特别快,绿皮火车变得非常落寞,是一个过去的符号。

新京报:你当年经过的民间和绿皮火车一样在变化,再次上路的时候,你是什么感觉?

周云蓬:19岁时四海为家,现在年纪大了,出趟远

门,不是为了流浪,而是参加一些大的音乐节,在法国、中国台湾、香港、云南,但是不管到哪儿,我喜欢活生生的民间,喜欢正被时代侵袭的那些如豫剧、评弹、苍蝇馆子、老巷子和老房子。时代让所有的地方都变得大同小异,就像绿皮火车已经是个稀罕物一样,地方戏曲、小吃、老房子、老巷子和民间的人情世故也在消失。我喜欢小城市,绿皮火车就会把我带往这种地方。

民谣没必要塑造新流行神话

新京报:近年民谣又热起来了,我们有可能像台湾民歌运动30年那样,做一个民谣复兴吗?

周云蓬:这几年,唱民谣的人又回来了,有人说是民谣复兴运动,但是我们还没法和台湾民歌运动

30年相比,他们有很好的文学艺术和文化传统的整体氛围。不过,如今信息时代,音乐可以更自由地传播,流行音乐作为一个产业面临了很大危机,它的衰落给民谣的复兴制造了机会。民谣更自由灵活,但是搞民谣的没必要塑造新的流行神话,刘欢和那英很难复制。

新京报:“民谣在路上”是民谣和公益结合的一个典型,也是你这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周云蓬:这两年,我参与的一个重要活动,就是十三月组织的“民谣在路上”。这是个和公益结合的活动,我感受到了当年背着吉他上路的新奇和兴奋。但不我不想自己完全变成一个公益歌手或公共歌手,音乐要保持它的独立性,不该被任何东西绑架或裹挟。

不想被情绪左右

新京报:你写作过很多直面社会问题的歌词,如《中国孩子》、《买房子卖房子》,在现在的写作里,你如何应付当下现实给你的影响?

周云蓬:不少民谣歌手都在关注社会,把种种奇怪的乱象写进歌词,在微博里,有很多可以创作的素材,但是他们不想沦为唱新闻的人,觉得音乐还是要像音乐,我倒觉得唱好新闻也是一种能力,我的《中国孩子》就很直白。

我喜欢写作,在写作中有时会刻意回避掉当时当世的一些糟糕事,但你活在这世上,很多事情回避不了。但我不想完全被某种情绪左右,我觉得,一个社会和时代还得存在,希望还在。

采写/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